

松叶文丛

东南大学出版社

听箫楼五记

顾农著

顾 农 著

东南大学出版社

听箫楼子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听箫楼五记/顾农著. —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
2004.8

(松叶文丛/徐雁主编)

ISBN 7-81089-627-X

I. 听… II. 顾… III. 社会科学—文集

IV. C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4)第 033847 号

丛 书 名 松 叶 文 丛

书 名 听箫楼五记

著 者 顾 农

出版发行 东南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南京四牌楼 2 号 邮编:210096

电 话 025-83792327 83792214(发行部)

传 真 025-57711295(发行部) 83362442(办公室)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1168mm 1/32

总 印 张 89.5 总字数 2 224 千字

版 次 2004 年 8 月第 1 版 2004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160.00 元(全 8 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顾 农

我的学问之路(代序)

年纪越大,不免感到时间过得越快;大约是手头上总是事情比较多的缘故吧,倒还没有致力于回忆往事——一时忙不到这等不及之务。事既已往,那就让它过去吧。

现在要根据这一套丛书的规范,来谈自己的学问之路,非回头看看不可了。我很高兴抓住这个契机,把将近六十年来的陈迹稍加清理,收束一下,这对于更清醒更充实地走向未来,也许是不无裨益的。

沉闷少年

我的故家是个大家庭,弟兄姊妹有六个之多,我是老六。小时候我们家租住在江苏泰州城北一条幽静的巷子里,门并不大,里面却是前后好几进的大宅子,有两口水井,两个大门,还有后门——那是房东家用的;我们家住厅屋,外加几间耳房,这里仪门、火巷、花厅一应俱全,还有一个小园子,虽然不算是我们家独租的,但也并没有外人进来。我家有单独进出的大门和单独使用的水井,两个天井,院子里一个,仪门到大门之间还有一个更大的。两个哥哥有时在这里踢球。仪门有一过厅,是下棋乘凉的好地方。

房东姓方,是一家面粉厂的老板,外地口音,只有一个女儿。父女俩住三四十间房子,太冷清了;而我们家祖孙三代,孩子又多,据说方老太爷就是看好我们家人气之旺,我父亲又有很好的声誉,才租给我们家的,房租并不算贵。

先前我们家确实很热闹,几个姐姐都非常出色,成绩好,能讲演,会演戏,二姐尤其是文章高手,还办过学生文学刊物呢!

不过这些事当时我都不大了然。我比我二哥要小七岁，比上面的姐姐们更要小到十多岁，而且我小时候大约很糊涂，简直记不得什么事情了，只是看他们都忙得很，不大有工夫同我玩。

比较有印象的只有两件事，一是大约在我四岁的时候就被送进一家私塾里去读书，这私塾就在我家斜对门，先生姓高，一把白胡子，人最和气不过。他有一个孙子和我同年生的，常在巷子中间一段铺着青石板、最宽最干净的地方一起玩。白天姐姐哥哥们都上学去了，我一个人在家很无聊，缠着妈妈讲故事，可惜她老是生病，也没有多少好玩的故事，尽讲些早就听烂了的，听得逼人耍赖。于是父亲决定把我送到高老夫子那里去上学，“关他半天也好”。

这学上得很自由，我愿意去。什么时候到都可以，去了以后先磨墨，先生要求磨半点钟，要用劲磨，墨要拿得正，不能把墨锭磨歪了；磨好墨就趴在我那张书桌上描红，上午一张，下午一张。下午描完以后，就把两张一起送给高老夫子看去。他让我把每个字念一遍给他听，念对了就摸一下我的头，他不摸我就知道错了，重新念，如果还不对，先生就说：“你又玩糊涂了！”重新告诉我这是什么字，在什么话里头有这个字。接下来布置明天要描的一张，把上面每个字讲一遍，让我跟着念，念完就可以放学回家了。不回家再在这里玩一会儿也行。

上午描完字还有好长时间才吃中饭，高老先生允许我在他院子里玩，看蚂蚁搬家，拍皮球，滚铜板，但不许大声说话；其实只有我一个人，也说不成话。还可以在自己的座位上看小人书，但只能自己一个人看，不准别的学生看——他们岁数比较大，功课多，不能分心。中间随时可以回家：喝水，小便，洗手都回家进行。我回家主要是洗手，磨墨和写字的时候很容易把手甚至是脸弄脏；每次回到家，总是外婆帮我洗，一面洗一面说“看你脏的，学问又大了！”洗完给点好东西吃一吃，打发我“回

学堂里看书去！”我的“学问”大约就从这时开始上道的吧。过了一年，高先生又教我算术，全用口算，不写，也不用做功课。

外婆对我最好，她又最会做菜，比我妈能干多了。她一天到晚手脚不停，姐姐们劝她歇歇，或要给她帮忙，她老是说：“你妈小时候太苦，把身体弄坏了，还是我来。这点事算什么，你们念你们的书去！”

印象深的还有，一天当中最热闹的晚上，姐姐哥哥们都回来了，吃罢晚饭就分两张桌子点起大煤油灯来做功课，几间屋子里到处亮堂堂的；父亲也在他房间里看书或者写什么东西。他那里少去为宜，一去他就会写几个字来考你，不管这些字高先生讲过没有；不去他就不问，也不教你认别的生字。两个哥哥偶尔吵闹，会被他训得鼻塌嘴歪。我在两张做功课的桌子之间来回窜动，问这问那，要他们帮我画张画，要像小人书上那样的。闹到他们嫌烦的时候，往往由二姐牵头，每人拿出一一点零用钱来，凑齐了交给我，到街头上买点花生糖果来。我最高兴跑这个腿，买到手以后先尝一点，回家分六份，我那一一份总比较多，吃完没有心事了，我也就困了，睡觉。他们什么时候睡我不知道，第二天起来的时候他们早就上学去了。

大约老在临睡以前吃东西，我后来牙坏得很早，至今已经没有什么嫡系部队，多半乃是不大管用的杂牌异己分子。

可惜这样有趣而且热闹的时间很短。1949年以后，情况很快发生了大的变化。首先是二姐突然离家出走，到处找不到，父亲急得团团转，老是冲大家发火，妈妈躺倒了，眼泪不断；只有外婆不算太着急，她说“二姑娘是最聪明的，她不会出什么事情，再等等看。”后来才知道她怕家里不同意，悄悄地跟着解放军过了江，在镇江一家革命的报馆里当记者。过了一段时间寄回照片来，戴一顶八角军帽，又漂亮又神气。没多久大姐到上海读大学去了；三姐也去读大学，据说是革命大学，和一般的大学不同，

没有读多长时间就去朝鲜打美国佬去了。知道二姐私自离家跑出去革命的时候,父亲很生了些气,说女孩子革什么命,还是应该读正牌的大学,她会出成绩的;但他很快就进步了,稍后三姐去读革命大学,他没有反对;他明白,反对也没有用,无非多一个出走的。我的两个哥哥,只相差一岁的老四老五这一对“难兄难弟”(父亲总是拿这句话批评他们,那时我不懂他们为什么都“难”,但不敢问,怕把自己也“难”进去)常有纠纷发生,父亲决定分而治之,让老五到镇江去读高中,交给二姐负责;老四虽在泰州读高中,但他自己非要住校不可,所以也不在家,只有星期天才回来。这时是1951年。

这一年私塾关张,我已经七周岁了,于是进小学去读书,因为我字认得多,又写得好,也会四则运算,一进去就上三年级。级任老师说可以上四年级,我妈不同意,说不要把身体读坏了,于是我一出茅庐就算三年级学生。高老先生听说这事以后很高兴,逢人就说他教的学生哪一个也错不了。

也就从1951年开始,我的生活就变得非常沉闷,前后十年。家里冷冷清清,我呢,上学,放学,做功课;吃饭,睡觉。惟一的乐趣就是看小人书,租书摊子的书全看了一个遍,于是又拣好玩的再看一遍。因为人少了,我们搬了家,房子小得多,还是显得空荡荡的。外婆越来越老,妈妈身体越来越坏,先后去世。本来一个很热闹的家,就剩下我和爸爸两个人,人气一点也不旺了。因为人少,我有了一间专用的书房,称为“西轩”,将近十平方米的样子。按说这里是西边的厢屋,但“西厢”二字显然决不可用。

那时还实行棺木土葬,我妈妈的棺材停在正屋里好几个月没有入土,父亲从来不讲为什么要这样,我也不问。同学有知道这事的,问我怕不怕,我怕什么?那是我妈。爸爸一天天老下去,他惟一的乐趣就是看信,看姐姐、哥哥们的信,更高兴的是看他们寄来的照片。我二哥在大连海军工程学院上学,穿一身尉

官的军装,神气不过,寄来的照片最多。我则得以集到了不少好邮票,其中有外国的(匈牙利)。我大哥在南开读了一年英语后被派往布达佩斯罗兰大学留学,这是爸爸最得意的事情之一。

晚上我做作业,父亲看他的书。他一般只看线装书,他的藏书九成以上是线装的。看到得意处他就用一种特别的调子低声吟诵,听上去很有点古怪;他说当年他上私塾(他上过十年,读遍了群经诸史)的时候先生就是教他们这样读书的。读书读书,就是要读出来,能背出来就更好。

爸爸从来不问我功课如何,成绩单拿回来也不看,要我读给他听。成绩比较好的时候,在写家长意见的格子里就盖上他最喜欢的一枚印章——据说出于某名家之手,名字



人的旅途

我没有记住;而如果差一点,则用普通常用的那一枚。那时家庭作业很少,晚上没有事干,我就翻他书橱里的书看,乱七八糟地读了不少。先把家里所有的小说读了一个遍,其中有些能够与过去看过的小人书相印证,由此颇能感到读书的乐趣;后来觉得有些小说也没有什么大意思,就改读《古文观止》、《史记》、《世说新语》之类,《文选》和《庄子》也翻过几下,不认识的字和不懂的句子太多,就搁回原处了。读古书有不懂、断不了句的地方,去问爸爸,总能得到简明的回答。有时我对他的答案有点怀疑,他并不固执己见,要我查字典辞典,再加研究。《康熙字典》和《辞海》就在他的书案上,他自己也常常翻查的。

许多书就这么半懂不懂地读了下去,所以后来学教科书里

的文言文,觉得很简单,而老师却翻来覆去地讲,细细分析,好像并无必要,于是就常在课堂上偷偷看别的书;有一次被老师捉住,挨了批评,说三好学生怎么也不守纪律;老师还罚我讲一段,这难不倒我。讲完老师说“很好。不过你可以学得更深入些,学问是个无底洞啊。”我始终记得他说这话时认真的神气。

到1961年高中毕业的时候,班主任和语文老师都让我考北大中文系,而我却一心想学新闻,像二姐似的当记者——这时她已经是新华社的名记者了。父亲随我的便,只是让我问一问二姐,该怎样填报志愿才对。自从我妈去世以后,他就有点老子无为而治的意思。二姐说当然读中文系,新闻有什么搞头,没有什么学问,文章只有一天的生命。我最相信她,于是就进了北大中文系。

上中学的那些年我常常感到很苦闷,说不出什么道理来,总之生活很无聊。所以晚上常去看电影。父亲从来不反对我看,他平时很早就上床,这一天总等我到家才睡,有时还问今天的电影水平怎么样,我总说好看,他也就高兴了。其实有些电影并没有多大意思。有时看完电影我也很想当个作家,写出自己的名著来,至少要比那些无聊的小说和电影高明。

读了三四年古书,我变得老成有余,活泼不足,不会唱歌,不会游泳,不会打牌,什么都不会。不会玩也就不想玩。亲戚们都夸我文静,坐得住,能做学问;他们根本不知道我心里很苦,我也不说。

燕园七年

北大那时实行五年制,还有六年的专业。一开学,杨晦主任就在迎新大会上讲,北大中文系不培养作家,这里是培养学者的。当作家在我本不过一时兴到之意,无可无不可,那就不当算

了,当个学者也蛮好。新同学中不少人本来是非要当作家不可的,有的还发表过小说或诗歌,这时全傻了眼,过了好长时间才回过神来,不得已只好准备当学者。

我很顺利地适应了这里的学习生活。当时名师如云,游国恩、王力、吴组缃、林庚、王瑶、彭兰、朱德熙、吴小如、陈贻焮诸先生都给我们上课。吴小如先生一年级给我们讲诗歌选和散文选,那些作品有若干是我先前读过的,但听他一讲才知道这里面还有许多奥妙,是我过去没有弄清楚或者根本没有想到的。稍后听彭兰、陈贻焮、赵齐平诸先生讲文学史,风格各异,又得到多方面的启迪。读文学作品只是认得那些字和能讲出大意来,这是远远不够的,这里牵涉到文字、音韵、训诂,要研究文章的作者和时代,义理、考据、辞章,各种学问,一样也不能少。“学问是个无底洞啊”,我对这话有了新的体悟。那些年真的读了不少书,读得比较上路,同过去的囫囵吞枣乱读一气相比,颇有天壤之别。

北大特别自由,课外时间很多,图书馆里书太多了,读书条件太好了。在一个位置比较偏的分馆里可以借到线装书,一函只要一张卡,一次可以借出一堆来,记得有一回我去借《六十种曲》,特别带了一个大网袋去,费很大力气才运回三十二斋四楼的宿舍。星期天有各种讲座,随便听,最是开人胸襟,益人神智。有一次听图书馆梁思庄馆长开的讲座,才知道除了二十四史以外,还有“三通”以及扩大化的“九通”、“十通”,才知道什么叫“引得”以及它的妙用,才知道想查某一方面的资料如何着手才能比较快地到手。北大的课可以随便旁听,我听过几次讲版本、目录、校勘的课,大开了眼界,得到一个基本的线索以后不再去旁听,自己找书来看。我还到哲学系旁听过名家为高年级开的课,不少地方听不懂,提到的书没有读过或简直没有听说过,两节课听下来,完全坠入云雾。缺少先期知识准备则乱听无益,后

来我不再乱听课了,一味听讲座,讲座不要求听众有多少知识准备,容易懂,收获大。做学问当然要多读书,但读书大有门道,过去其实尚未入门。知识的门类甚多,过去所知太窄,非大大扩展不可。当学者就要当大学者。



顾氏三兄弟(右起二哥顾宗炎、大哥顾宗英、顾农)

读得多了,听得多了,便发现同一作品、同一问题往往会有不同的分析、不同的看法,有的相去甚远,有的差别细微,各有各的道理,为了得一究竟,常常苦思冥想,半躺在未名湖边草地上发呆。老师在课堂上也介绍一些学术界不同的意见,推动我们去思考。我曾经在一份为《北大人》写的小传中回忆那时的情形道:

在母校时,宿舍里几乎每晚都有清谈,上自国家大事,下至鸡毛蒜皮,无主题无旋律无所不谈,重点自然在文学,而文学中又课内课外古今中外阳春白雪下里巴人无所不谈,重点自然在课外。人人以未来的大学者自居,当仁不让,振振有辞,放言无忌,动辄抬杠。抬完了,相视而笑,莫逆于心,洗脚睡觉,明天再谈。尔后三十年间,此种“魏晋式”或“五四式”的盛会是没有了,令人思之如失恋者。只

有等到老同学聚会时,才能略略重温旧梦,接着再谈,可惜头发渐白,世故渐多,而且行色匆匆,不免是叙旧存问多于无边际的纯学术讨论了。即使偶有讨论,也温文有余,生气不足,失去“火药味”。幸而杠还可以抬得起来,嗓门一高,儿女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意外,来相探视,其实什么也没有发生,与当年相比,小巫而已。(《北大人》第三辑,华夏出版社1995年版,第126页)

后来我写文章对于不以为然的意见往往直截了当地提出不同看法,无意中得罪了不少人。我忘了对方并非自己的老同学。前不久我为老同学曾贻芬、崔文印伉俪合著之《中国历史文献学》写书评,除了对他们取得的突破表示无限钦仰之外,也提了不少意见,文印来信表示非常高兴,说好久好久听不到这样真率的话了。文印正是当年清谈的高手之一。

那时正是经济困难的时期,总是不大吃得饱,同学们一个个面黄肌瘦,还有小腿浮肿的,但图书馆阅览室里人气极旺,常处于过饱和状态,稍微去晚一点就没有座位,只能怏怏而出,别求乐土。我因为大哥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教书,常给我加油,没有浮肿。几个姐姐和二哥都到北京来出过差,每次来都给我带来吃的、用的,生活费则由二姐每月寄来,伙食和零用均达小康水平,可以大看电影(学校里放电影,无论是大食堂还是东操场,门票都是五分钱),买书。几年下来,买的书可以装四五个纸箱子,也达到了小康水平。这些书绝大部分都是从海淀旧书店买来的,一两毛钱一本,很好的书。去过两次厂甸,也买过几种,例如四部丛刊本的《乐府诗集》、《唐诗纪事》、《文心雕龙》等等,这些书记得家里没有,可惜要一两块钱一部,只能尝鼎一脔,聊备一格。主要靠图书馆。

那时我们不大写文章,根据老师的意思,主要写札记,走顾

炎武《日知录》的路子，所以绝不打算拿出去发表。写完就放在那里，请老师看看，改一改，或者自己又有新的想法了，也拿出来改一改，改完继续藏之篋底。记得最清楚的是陈贻焮先生审阅过我写的关于阮籍、谢灵运、鲍照等人之诗的札记，用铅笔在上面有不少批改，后来我大加修改誉清过一份。去年年初我搬进新居，将原来到处乱塞散在各处的往日丛札作一彻底清理，忽然发现关于阮籍诗的数纸，尚有可观，遂稍加修润，交《书品》发表。还有些旧时札记不宜单独成立，则并入论文作为一节或一条注释；当然也有胡说八道的，有无何新意，或曾经算新而现在已经不新了的，便拉杂摧烧之，当风扬其灰，以了却旧缘，清出底盘，重新开始。

因为想深入一点做学问，当时还和俞平伯、余冠英等先生通过信，其缘起大抵是课堂上老师提到他们的见解，我有疑问或不同的想法，所以去信质疑请益，诸位前辈热情地做了回答，给我很大的教益。转益多师好处多，我后来又得到许多师辈的指导和帮助。所以等到我年纪大一点而有青年人来不耻下问时，态度也非常热情，以此来回报我的师辈。

我们虽说是五年制，其实只读了四年书，因为整个四年级全用来下乡参加“四清”运动了。先是在北京郊区的通县，一个多月，睡在老乡家的热炕上，所见所闻都挺新鲜，我对北方农村有所了解，这是头一回。古代诗歌里写农村的很多，过去以为好懂，到此时才知道其实懂得很浅。

第二次搞“四清”在湖北江陵，前后十个月。南方的农村又是一番风味。我住的那一家根子户穷得不堪，我和一位同学两个人一头一脚地睡在他家装粮食的木头柜子上，腿伸不直，也不好翻身，就环在那里，倒也能睡得着。进住不久，房东老太婆去世，父子二人自己动手做了一个棺材，准备埋到一块荒地里。因为正在搞运动，乡下土道士不敢活动了，房东大爷要我们下葬时

在前面“开道”，就是唱一段葬歌；我们不会唱，而且工作组的人也不能搞任何迷信活动，把这一层意思委婉地说给房东，他听了大不以为然，说：“你们在大学里都学些什么！”当时我们觉得这是秀才遇到兵了，哭笑不得；后来才悟到这里曾经是楚国的故都，我们是该来一首合于老太婆身份的《招魂》才是。下葬那天我们都去了，只见前面有一个他家在邻村的亲戚来“开道”，唱了老长一段，基本听不懂，这应当就是所谓“楚歌”的遗存，很应当记录下来，可惜我们那时满脑袋“四清四不清”，更不敢沾这种迷信的边，默默地帮着挖坑填土。“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运动当中风云变幻，故事很多，等我退休以后有时间了真该把那些有意味的事情写下来，这里无从多叙；但总而言之，大家的学者梦基本醒了。中国将发生大的变化，学问恐怕是做不成了，最现实的一件事就是本来四年级要写的学年论文已在无形中被取消。不写学年论文，不可想像的事情，而现在则是理所当然的。那还有什么话可说。原来大家已经准备好在四五年级选学哪一门第二外国语，现在看来也已不能或简直不必了。

五年级主要开选修课，我选了《诗经研究》和《唐诗研究》，前一门课由一位曾经当过工作队主要领导的老干部出身的先生来主讲，同学们忙于写毕业论文，有一搭无一搭地听听，觉得无多精彩，倒是助教金开诚先生给了我们很多切实的辅导和帮助。有人私下甚至说不如请金老师主讲。《唐诗研究》是由林庚先生开的，十分精彩，林先生上课时很像个诗人（这话错了，他本来就是著名诗人），感情很激动，讲到来神处摘下眼镜敲敲黑板上写的几个字，嘭嘭直响，叫人担心别敲碎了。但下课以后围着老师问问题的人比过去少多了，不少同学总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我因为是课代表（我们班上谁愿意当某一门课的课代表，就由他来当；如果不止一人，则自行协商决定），算是认真的，有

一次为一件什么事务还到燕南园林宅去过一趟，顺便请教过几个问题。他的房子比一般老师家宽敞阔气多了，客厅角上有一架钢琴，尤为罕见。林先生一再强调诗要领悟，要与古人心心相印，学究论诗容易“隔”。我完全赞成他的意见，可惜的是有些诗很难领悟，我问林先生怎么办，他笑笑说：“怎么办都行，慢慢领悟。你还太年轻，再长大一点就能领悟了。”当时我虽唯唯称是，其实不大明白他的意思。到后来，经历了更多的世事，才知道年轻固然是一难能可贵的大优势，但也有问题，那就是有些诗难以真懂。

我们的毕业论文没有写完就停了下来，写大批判文章；不久大字报上了墙，“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五年级留校闹革命。一直革到1968年春夏之交才拿到毕业证书走人。其间风云变幻，故事更多，这里也无从细说，总之五年级的学生参加“文化大革命”比较而言热情不算太高，有些事情不大高兴参加。为了有点事情干干，我和另外几个同学编过一本《鲁迅语录》，由北大印刷厂印成，六十四开，塑料封面，像《毛主席语录》似的；又编印过一本《鲁迅旧体诗注释》，三十二开平装本。当时还有人编印毛主席诗词的注释与讲解，有人编印某一方面的批判材料汇编，八仙过海。这中间我还到大同煤矿去办过阶级教育展览，是中央美院的同学到宿舍里来串联把我们拉去的，他们画，我们写，我当时搜集了不少矿工歌谣。老一套的古代文学学问做不成，也不想做了，干点别的事。当时觉得这也许不算学问，但又有什么办法呢。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到处留心皆学问，是我当时常常想到的两句话。

教书生涯

离开北大以后我到了山东，在一间农村中学教书。我的一

个中学同学大学(四年制)毕业后在山东工作,“文化大革命”中她到北京来串联——那时规定65届毕业生可以串联,最好回母校造反;他们虽已工作一年,尚未转正,所以还算是革命小将,大家都没有多少事做,于是立刻掉进情网。我们早已很熟,谈得来的,只是彼此都讲究保持适当距离;这时则忽然有所突破。于是我们又一起回故乡串联,跟双方的家长都见过面。那时她父亲作为“反动学术权威”正在挨批斗,我父亲已到风烛残年,都希望我们早点结婚。于是不复考虑其他,到山东去当中学教师,马上结婚。这一年我24岁,她26岁。同学总是比我大,至少两岁。山东同事说,女的大一点好,我不知道大有什么好处。后来到1997年,她按时退休,从此家务事日益走上轨道,我也得以躲在书斋里自得其乐。女的大一点好,这时才有切身的体会。当时也根本不考虑谁大谁小,无非是结束终身大事,让双方的家长了却一件心事,我们自己也安下家来过日子。后来为了靠近老人,我们分两拨调回故乡泰州,我继续教中学,她则继续在医院里工作。



作者在办公室里伤脑筋

教中学很有意思,学生比较小,总是跟着你走。中学语文教材虽然老是换来换去,但万换不离其宗,总是古今中外什么都有。教师的知识面非宽一点不可,这一方面我还能对付;但也